

# 三邊互動

## 三邊互動

### 三邊互動

彈指一揮間，中國的改革開放已經走過了三十年。紀念改革開放的文章，也在各種媒體上開始湧現。改革開放需要紀念，這本身就說明改革開放的大業並沒有完成，而中國在走向自由、民主和市場經濟的道路上依然步履蹣跚。在今年未來的幾期中，我刊的「二十一世紀評論」欄目將重點刊登反思、評論中國改革開放歷程的文章，「百年中國與世界」欄目將刊登有關中國改革開放的政治史、經濟史、社會史、思想史和文化史的論文。懇望海內外作者惠賜佳作，為中國的改革開放事業發新思、闢新路。

——編者

## 中國式的科學腐敗

曹聰在〈從「漢芯事件」看中國的科學腐敗〉（《二十一世紀》2008年2月號）一文中，全面分析了「漢芯事件」的背景、起因與影響。從性質上來說，「漢芯事件」是一種中國式的科學腐敗，其根源在於當前中國科學界已經形成的一種科學與政績相結合的畸形發展模式。

陳進之所以能在短時間內迅速獲得巨大的「成功」，與其

說是他的造假手段高超，還不如說他的出現，正好滿足了掌權者的政績需求。當前瀰漫於中國社會的GDP崇拜，也就是數字出官的現象，在中國科學界也是重災區。陳進所擁有的海歸頭銜、SCI論文數量、「長江學者」稱號、高新技術產品、產學研成果訂單等，都是當前政府科技部門、高校科研單位政績考核的重要指標。

陳進的所謂科研活動，在學術官僚眼裏，其作用與意義並不是單純的科研創新行為，而是能夠帶來實實在在的政績數字，有助於他們的仕途一帆風順。而目前盛行的官場潛規則也昭示人們，為了創造更高的政績，有時候是可以不擇手段的。所以陳進的學術履歷造假，其實與各級政府統計數字造假並無兩樣。在「漢芯事件」曝光初期，上海交大對其行為的袒護就是一個明證。在這種利益動機的驅使下，一場鬧劇的發生也就不足為怪了。

從這個意義上講，政治決定科學，有甚麼樣的政治，就有甚麼樣的科學。在政績造假層出不窮、政治腐敗日益嚴重的今天，期待科學界成為淨土，無異於痴人說夢話。民主國家韓國在「黃禹錫事件」上的

表現與中國截然不同，不也是正好說明了這個道理嗎？

嚴泉 上海

2008.2.21

## 視野：橋與牆的博弈

馬軍的〈吳國楨視野裏的周恩來〉（《二十一世紀》2008年2月號）一文，揭示「偉人」平凡的一面。吳國楨和周恩來昔日雖為同窗，後來卻成政敵，其視野裏的周恩來平凡多於不凡：聲音尖，擅長演戲，且「總是扮演女主角」；「從南開中學畢業後卻沒能進入高等學校學習，而不得不自己謀生」；「可能存在着某種家庭問題」……同時他認為周恩來的政治之路及政治策略也和早年這些經歷密切相關。在大歷史視野的宏大敘事中，「偉人」的流光片羽都被無限放大，無限神化，成為傳奇，馬文彰顯了周恩來不為人注意的另一個側面。

但同時也必須警惕，視野既是橋也是牆，開啟一扇門的同時，也可能關上一扇窗。吳國楨的回憶也有一定的局限性，而且，歷史真相也僅是一個不斷接近終點然而永遠無法抵達的過程。馬軍在〈吳國楨對張伯苓、周恩來和南開中學的回憶〉（《檔案與史學》，2002年第5期）也運用和本文相似的部分材料，但內涵卻與本文明顯不同。如懷特（Hayden V. White）在〈作為文學虛構的歷史文本〉（“The Historical Text as Literary Artifact”）裏指出，「關鍵問題是多數歷史片斷可以用

許多不同的方法來編織故事，以便提供關於事件的不同解釋和賦予事件不同的意義。例如米歇利特把法國大革命的歷史描寫成浪漫主義超越論的一個戲劇，而他的同時代人托克維爾卻把法國大革命描寫成一個令人啼笑皆非的悲劇，我想，馬軍對吳、周的研究，同樣經歷橋與牆相互博弈的過程。

羅慧林 南京  
2008.2.25

## 治理司法腐敗應多管齊下

賀欣在〈中國法院的財政不足與司法腐敗〉（《二十一世紀》2008年2月號）一文中，認為財政不足是導致司法腐敗的重要原因，在財政不足的情況下進行改革很可能帶來更多的腐敗機會。他對比了不同財政狀況下的法院，認為在財政充裕的情況下，法院沒有太多理由在訴訟費和罰沒款上做文章，也很少會出現主動找案源、優待制度當事人、以罰代刑等腐敗行為。

按其邏輯，可以大膽地推論財政不足的法院比財政狀況好的法院更腐敗，基層法院比中級和高級法院更腐敗，中西部法院比東部法院更腐敗。但事實上，法院層級愈高，腐敗度可能愈大。當前查處的司法腐敗大案，多在經濟條件較好的法院，如深圳、武漢中級法院。財政不足充其量只是導致生存型司法腐敗的原因之一。

司法腐敗的原因是多方面的，還有法官素質不高、司法倫理墮落、司法獨立欠缺、制度

約束不足，特別是發現腐敗的概率低、打擊力度弱等原因。其中制度原因是最重要的。

保障法院財政確實是治理司法腐敗的重要措施之一，但因此否定其他方面的重要性，否定制度改進本身，則有「只見樹木，不見森林」之嫌。中國的司法腐敗既然是極其嚴重的「頑症」，其治理就不應「只見樹木」式地「對症下藥」，而必須全面下藥，多管齊下。

徐昕 重慶  
2008.2.26

## 極權下的健全人性

徐賁閱讀克萊普勒(Victor Klemperer)的日記《我會作見證》，寫下〈極權統治下的日常生活〉（《二十一世紀》2008年2月號），從中可以看到徐賁揮之不去的人類憂思，這不僅是對納粹極權政治的憂思，也是對中國文革的專制極權的憂思。

徐賁站在人道主義的自由知識份子的立場思考社會公正問題，批判一種群體的極權人格。希特勒說，在德國只有一個人在民眾中的受歡迎程度可與他相比，這個人就是路德(Martin Luther)。德國為甚麼出現納粹，主要原因是德國人的奴性，路德的性格在弗洛姆(Erich Fromm)看來是典型的施虐和受虐性格，缺少健全的理性，最典型地代表了德意志性格的兩面性。中國的情況也相似。徐賁認為，克萊普勒在極端恐怖的環境中選擇作見證，顯示出人性的尊嚴。

徐賁的思考有很深的存在主義特質，他看到人的根本惡性是永恆復返的。正如阿多諾

(Theodor W. Adorno)所說，人至少應該有最低限度的道德。徐賁一方面對世界充滿懷疑，但另一方面對極權和暴力持毫不妥協的批判立場，顯示了堅定的德性操守。

張典 南京  
2008.3.2

## 韋君宜現象再思考

張玲霞的〈挽回中國知識份子的尊嚴——讀韋君宜〉（《二十一世紀》2007年12月號）一文引發了筆者一些思考。韋君宜喜歡說自己的職業是作家，許多人在討論韋君宜現象時也認可韋君宜是知識份子。但筆者覺得這個身份定位是有問題的。韋君宜不僅是黨的幹部，而且是黨的高級幹部。

周揚、蔣南翔和韋君宜晚年都對自己害過人表示懺悔。筆者覺得這樣懺悔既不足以彌補受害者遭遇到的損害，也不足以彌和其自身人格的缺陷。畢竟過去七八十年裏，受難的真正的知識份子遭遇到更多的痛苦，他們中的大多數人已經沒有機會再發表意見了。

不要將責任都推給專制制度，害人者更應自我反省。十七年的專制和文革的無政府主義，為個別黨的幹部創造了無法無天的大好時機，他們可以利用不受制約的權力達到一己之私利。韋君宜的回憶錄僅僅表達了她自己的感受，不應該被抬高。覺得一個人不好就把他整死或者整個半死，這是社會主義理念的錯誤嗎？毋寧說，周揚、蔣南翔和韋君宜等人搞的本來就不是社會主義。

鄧廣 北京  
2007.12.22